

彝汉文辑夜郎史传秘本



王子尧 刘金才 © 编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彝汉文辑夜郎史传秘本

王子尧 刘金才 编译

王子尧 山口八郎

王富慧 王春艳 著译

李天元 杨 伟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汉文辑夜郎史传秘本: 彝、汉 / 王子尧, 刘金才
编译.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81126-481-4

I. ①彝… II. ①王… ②刘… III. ①夜郎 - 民族历史 - 研究 - 彝、汉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5809号

彝汉文辑夜郎史传秘本

王子尧 刘金才 编译

学术顾问: 安毅夫 余宏模

责任编辑: 立 道 张 辉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390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481-4

定 价: 8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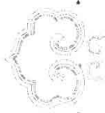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彝族是贵州最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在以往历时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彝族曾经是贵州这片土地的政经主导者。在很长的时期内，贵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都受到彝族的文化传统影响。

彝族的文字史同汉文同样古老，彝族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彝族作为一个既有文字系统又有丰厚文献的古老民族，给民族学、人类学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也将贵州的彝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

贵州对彝族文字和文献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的《爨文丛刻》就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1949年以后，由丁先生开创的研究一直是贵州彝族研究的主线。贵州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收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彝族文献。王子尧、刘金才等人编译的《彝汉文辑夜郎史传秘本》是贵州当代彝文汉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彝汉文辑夜郎史传秘本》（简称《夜郎史传》）原系彝文手抄本，世代传承，其内容主要为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以及相关其他武支系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本书编译者之一王子尧先生出生乌蒙山区“芒部毕摩”世家，幼承家学，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后主要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文字、翻译、古籍、民俗、宗教等文化研究，现任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主任、译审。《夜郎史传秘本》底本即为王子尧先生家藏。刊行本书，意在保存历史文献，使其惠及后人。为使更多读者能够阅读和了解这个珍贵的彝文本子，征得王子尧先生首肯，我们将这份珍贵的彝学文献辅以汉译对照，刊行于世。

于此附带说明的是：编者在本书出版时尽量着眼于保留彝文典籍的原貌，仅做了少量文字加工，对这个彝文本子的内容及结构基本未作改变，此过程中，酌情添加标题。编者限于自身水平，刊行后的本书，错误与欠妥之处，恐怕所在多有，敬请方家不吝指教，也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出版者

序一

◎龙志毅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珍惜、保护、研究并传承下去。

以彝文文献典籍为例，就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数具有不菲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彝文文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保护与整理。三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彝学研究也同样日益发展和深入，不仅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彝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在其中，贵州彝学界有大量优秀的彝族学者和彝学研究著作。此外，历史上与现当代的许多海外学者也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彝学研究著作。

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优秀彝学研究进行整理、

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彝学若干重要著作结集出版，是一项很可喜的文化工作。我希望出版社、学者以及有识之士将这类工作持续下去，为贵州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史学会会长，彝族）

序二

◎余宏模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人多地广的“最大”实体。战国时期即已立国，它既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大而显耀的实体，自有与此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应为中华民族绚丽多姿古代文化的部分，并是当今西南某些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夜郎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开疆守土，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夜郎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一个颇富学术价值的系统研究课题。唯其如此，对夜郎的研究受到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

20年前，贵州学术界就曾经举行过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就夜郎问题作过广泛的研讨，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如对秦汉时代夜郎的社会形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已处于奴隶制阶段，存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及与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对此时期夜郎地区各部的关系，也都认为存在着约定俗成的联盟，后由中央政权法定为等级分明的统率关系。对秦汉王朝开发夜郎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认定夜郎与中原及巴、蜀、滇、楚、南越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文化上早有内、外在的联系。在夜郎地区的交通问题上，对通向南越地区的主要水道牂牁江系今日何水，通向巴蜀的旱道经过的主要地点等，亦取得了趋于一致的意见。对夜郎的习俗大家认识略同，互为补充。

夜郎研究者们对夜郎问题虽然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取得某

些趋于一致的成果，但对其中的族属、来源、名义、地理、后裔民族等问题，归根到底为资料条件所限和研究方法不同，各抒己见而互存歧异，短期内尚难求得共识。

族属问题。诸家所论，有谢人说、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越濮羌同为主体说、彝族先民说、百越说数种。持谢人说者，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持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者，认为夜郎、牂牁皆僚人之居地，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即古濮人后裔。持越濮羌同为主体说者，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持彝族先民说者，认为夜郎由氏羌系的夷、僰、濮和百越系的僚人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即今彝族先民。持百越说者又分：一为百越濮僚等同说，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和僚人就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二为百越僚、濮两部分说，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分组成。三为百越闽瓯骆说，认为闽、瓯、骆本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名细究均含此自称之中。

来源问题。概言之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类。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有的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濮人，本是贵州一带土著；有的则认为是由西周就存在于当地的古牂牁国，在春秋时代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邑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持外来说者，人数颇众。其中：有的认为夜郎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压迫而迁到黔中；有的认为夜郎与东南越存在同源关系，他们源出东南沿海地区；有的则说夜郎本江汉一带濮人，春秋晚期为楚人驱迫，迁入今贵州一带；有的认为夜郎境内的夷人原住



金沙江两岸，迁入滇黔毗邻的乌蒙山区，征服濮人后扩向黔中。

名义问题。由于对族属、来源认识存在分歧，对“夜郎”的含义相应地亦有不同的解说。有持谢、浪说，释夜郎之“夜”乃“谢”之音转，“郎”古读如“浪”，是指溪谷之地，“夜郎”就是居于溪谷中的谢人。有的持僚人卜岁郎火说，认为古僚人中“有力者曰‘郎’”，卜岁郎火以夜晚作法，或即夜郎之称名来源。有的持源于山名说，认为古牂牁国首邑的今贵州安顺一带，左近有夜山、郎山，遂以“夜郎”名邑。有的持源于水名说，“夜郎”即彝语称谓的“以诺”，意为“黑水”，即金沙江。彝族先民“夷人”迁居于此，邑名“夜郎”。有的则以“越骆”为解，但互有小异。有的说夜郎的“夜”字疑即“于越”的“于”字，而“郎”与“骆”字音近，故“夜郎”乃“骆”的音译；有的说“夜郎”与“骆”，是越人语汇田野的缓、急两译，后来变音或异写作“僚”；有的认为夜郎群团的民族名称是“僚”，“僚”、“骆”同声而译写可通用，而“夜郎”最初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凡是与之亲近者均被称为“夜郎”。

后裔民族问题。夜郎后裔为当代何族或哪些民族与夜郎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亦有数说：一是夜郎故地濮人遗民即今之仡佬族；一是夜郎境内夷人，即今彝族先民，其夜郎遗民后裔，即今彝族的“依诺”支系。有的学者认为，夜郎故土上的居民后来逐渐演变为仡佬族和布依族；有的学者又认为，现今的仡佬、布依、侗、水、壮诸族，与夜郎均有程度不同的关系。

地理境域。主要有相当于汉代牂牁郡一郡说和地跨包括牂牁郡在内的数郡说两类。一郡说的见解主要有三种：（一）夜郎之地为牂牁郡一县，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是夜郎地

区，汉时设为含十七县的牂牁郡；（二）以今地理论，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地域东起今贵州黄平一带，西北至贵州毕节县，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贵州遵义，东南包括都江上游地带，西南经今广西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东南，即汉牂牁郡辖境；（三）夜郎的领域为今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亦在汉牂牁郡境内。数郡说的具体见解亦有三类：（一）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有时且超出此三郡之界；（二）夜郎在战国时的地域约当今贵州西部，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有犍为属县五个、牂牁郡属县八个和益州郡属县一个；（三）古夜郎国极盛时的疆域范围，不仅有今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及川南、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到湖南新晃，西至今云南曲靖、陆良，即含汉牂牁郡全境及武陵、犍为两郡的一部分。

中心方位。对夜郎地区诸家所见均甚辽阔，并都认为应有一个起核心纽带作用的中心方位，此中心在于何部？有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持且兰部说者认为，牂牁郡的首府在故且兰县，它自然是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中心，且兰君是夜郎中最大的王，其地在今贵州麻江、福泉、黄平一带。持夜郎部说者亦有四种不同认识：（一）夜郎中心在战国庄蹻入滇和汉武帝时唐蒙入使夜郎两条路线的交切点上，即今贵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市一带；（二）夜郎中心即夜郎侯邑，应沿唐蒙所开陆道和牂牁江源流寻找，它在今云南东北角上的宣威、沾益一带；（三）夜郎的中心，只要确定了它所临的牂牁江于今天哪条水就能弄清楚，今西江及其上游红水河、北盘江即古牂牁江，现在的黔西南地区就是古夜郎的中心；（四）夜郎王国直辖地的地理位置不能仅从临牂牁江确

定，还应从庄蹻入滇路线、汉代犍为郡的设置、南夷道的修筑和邮亭的设立考虑，它在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一带。

各家对夜郎整个地理范围的看法虽有不同，但十分明显的是都认为汉牂牁郡全部或大部分属县地，即今贵州省的绝大部分及与之相连的滇黔、黔桂交接地带属夜郎地区。对其中心所在虽似各持一端，但大多数论者不仅共有在汉夜郎国直辖地的见解，而且各自指出的具体地域大体趋向于在黔西北、滇东北、黔西南到黔南，均属夜郎王国直辖地。

综如前述，对古夜郎的研究虽有拓展但还需深入；虽有趋同但歧异尤多，还要经历充分运用现成的条件和创造新条件，在方法上还需解脱自我禁锢现象，博采众长，作多学科的综合探索。

在条件方面，最重要的是实物材料。就田野考古而言，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贵州各地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夜郎时期文物总数已逾千件。这些发现，虽然尚不能够揭示出系统的夜郎文化，但已从不同角度标示了夜郎文化露出的端倪。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普安铜鼓山、赫章可乐及威宁中水等三个地点古遗址与古墓葬的发掘，三处发掘出土文物最丰富，地方特征也最突出。在贵州以外的夜郎故地或其边缘，如云南曲靖珠街、广西西林普驮等处，也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古遗存。为解决夜郎来源至关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遗存，在夜郎故地也都有多种发现。对现存的考古实物，需要作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已知的地下出土材料是很有限的，今后还需加强田野考古，寻求更多准确有力的实物材料。

就文献材料方面，目前仍局限汉文文献而缺乏对民族文献的译著的研究。

而汉文文献材料本身的困惑，也造成探求夜郎的歧异和困难。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首记夜郎。其后，班固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写成《汉书》，继采前史遗事，对夜郎作了续记。对《史记》，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延笃因感“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史记索隐·后序》），乃作《音义》为之解说。对《汉书》，亦在东汉有服虔、应劭等人开始为注。到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史记》、《汉书》注家众多，并有常璩、范晔、郦道元诸人以前两书指趣略举，结约未伸，又分别撰《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对夜郎的叙述由略显详。但这些后出之书与司马迁、班固之书有抵牾言辞。历代名家作注文，尤显杂说纷呈。加以事过境迁，政区更改，山川易名，民族流徙时有发生，而史籍或版本前后增损衍缺，或其中汉文古今音义有变，或对少数民族称谓及语言译写各时期有异，致使后人对夜郎难以寻踪辨迹，需对诸古籍所记和前人杂说，究诂稽考而辨正是非，判剖义理而显其虚实。

民族文献资料，据今所知民间口碑传说资料，在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如布依族、仡佬族中都有关于夜郎的传说。但有自己民族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夜郎史籍，却只有保存在彝族聚居的乌蒙山区。如彝文巨著《西南彝志》等古籍，亦有关于夜郎世系及活动流徙的章节记载，曾译著公开问世。但是，较为全面完整记述夜郎史事的彝文古籍，则是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夜郎史传》，亦不愧是彝文文献中的煌煌巨著。

《夜郎史传》共计三卷，系彝文手抄本，抄本年代最迟不晚于清代时期。彝文古籍因多系世代传承，沿袭手抄收藏，故对原著版本、上限年代无可考据，



更不详著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但究其记叙《夜郎史传》内容，详细记载了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也记载有武部族与夜郎有关的其他武支系的活动情况。举凡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经济、军事、政治、联盟、战争等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论述，它胜过某些汉文文献记载的简略缺遗，可以互相补充印证。它作为彝族古代史家留下的遗产，和夜郎研究诸说中的一家之言，也可供当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对夜郎作多角度探索的借鉴，具有相当可贵的学术价值。本书译著者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副译审王子尧先生，系出生于滇黔毗邻乌蒙山区著名“芒部毕摩”世家，幼承家学，早年随侍其父王兴友老先生在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工作，后入中央民族学院深造，应聘在贵州民族学院任教多年，勤于译著，硕果累累，多次获奖，成绩斐然，为我省彝文古籍战线著名中青年学者。《夜郎史传》乃王子尧先生家藏秘本，经其本人数年辛勤耕耘，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学者专家的鼎力相助，特别是为使彝文的译著准确无误，严谨规范，译著初稿邀请了省内著名的彝文古籍专家，集体逐卷审阅修定，尽了共同的努力，为了争取此译著能成为高质量、高规格的精品，呈献于世人面前。

夜郎研究，方兴未艾，诸多问题，尚待深入。《夜郎史传》的出版问世，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和思路，新的资料和史实，有待研究者去鉴别取舍，发掘利用。谨此为序，并致祝贺。

1998年元月于贵阳八角岩下

序三

◎李廷贵

《夜郎史传》翻译整理成初稿时，我曾有幸拜读，并参加了三次讨论会。关于讨论的情况和对书稿的评价，诚如报刊和电台、电视台所报道的，这里不宜重复。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为《夜郎史传》作客观的评论。

为了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发掘、编纂和宣传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史是这样，对于汉民族史和各兄弟民族史也是这样。而要编写各民族的历史，除依据“书史”之外，还应该参考“心史”，只有这样，才较为公正客观而少些歪斜片面。

大家都知道，在写历史书的时候，要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凡是涉及到该民族的各种文字资料都须浏览，摘抄，然后整理成文、成书，这就是我说的“书史”，或者说“以书为证”。但仅限于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据“心史”，也就是该民族的史诗、传说、古歌，亦须发掘、整理，融于书中，使之更为丰满。外国史是这样写的，中国史也是这样写的，各兄弟民族历史也是这样写的，似乎没有特殊的例外。但个别史家却对“心史”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大笑话，所以这里才提出来讨论。

我们在编写《苗族简史》的时候，曾主张依据《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把“族源和迁徙”的起点放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但某教授却说“那是弄笑话”，他肯定“苗族是贵州的土著”，“苗族所说的黄河就是贵州境内的鸭池河”。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书之成文准备发表（幸好没有发表）。



后来，我们编写和出版的《苗族简史》以及《苗族历史与文化》等书，没有按照那位教授的观点，而是参照了范文澜等专家的“书史”，参照了《苗族古歌》（田兵、燕宝等翻译整理）、《苗族史诗》（马学良、今旦译著）和《苗族古史传说》（杨汉先译著）等“心史”。后来的“文化”出土和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等等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弄笑话”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位很个别的教授。现在《夜郎史传》也被某位教授嗤之为“大笑话”，他怀疑这部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可言。我却认为《夜郎史传》是“书史”与“心史”融为一体的史诗，这部史诗反映了“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既有“书”（彝文古籍）之根据，也有“心”（英雄史诗）之根据，何况有贵州赫章的可乐等地的出土文物可以作证，怎么会是“大笑话”？

可见，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必须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历史唯心主义。须知，“研究历史的人，方知历史是永远研究不完的”，“嘲弄历史的人，往往会被历史所嘲弄”，这是哲学家们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二。

以上是有感而发。在《夜郎史传》问世之际，让自己的观点亮相，一是推崇这部难能可贵的史诗，一是求教于大家，使其在百家争鸣中对民族历史文化之研究得到某些共识。至于我的这些浅见，算作序二吧。我作为贵州民

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的高级顾问，有责任把专家们的成果推荐给读者。我相信，看过这些稀世珍品之后，读者自有公论。

1997年11月3日于贵阳花溪河畔